

# 论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的 “羹匙曲线”\*

郭继强 蔡媛媛 林平

**【摘要】**文章使用完整工业化阶段划分和可比统计口径,考察了18世纪中后期至21世纪初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劳动收入份额演进状况,并对以往学界提出的“下降说”、“稳定说”、“U形说”和“三次说”之间的差异或矛盾进行解释。研究发现:(1)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轨迹形如“羹匙曲线”:在工业化初期经历下降,工业化中期显著回升,工业化后期相对稳定,后工业化阶段则呈现小幅回落;(2)倘若将劳动收入份额视为劳动者的“奶酪”,则工业化初期失去的“奶酪”可以在中后期复得;(3)对当前中国而言,及时把握工业化中后期处于压缩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机会窗口”更为重要和紧迫。

**【关键词】**劳动收入份额 工业化进程 羹匙曲线 卡尔多事实

**【作者】**郭继强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蔡媛媛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林平 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讲师。

## 一、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现有关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类观点:(1)下降说。西方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早期文献表明,在工业化初期劳动者会失去所拥有的一部分“奶酪”。考虑到西方工业化初期存在“工资趋向并稳定于维生工资”的事实(李嘉图,1987;Allen,2009),随着技术提升带来总产出增长,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占比或份额必然随之下降。就中国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快速下降,且持续偏低等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白重恩、钱震杰,2009;吕光明、李莹,2015;张车伟,2016),但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低位持续徘徊。(2)稳定说。20世纪上半叶以来,西方学者围绕着劳动收入份额长期稳定的“卡尔多事实”展开了一系列研究(Cobb等,1928;Kalecki,1939;Tripp,1951)。这种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消减了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家对要素收入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框架与具体路径研究”(编号:11&ZD013)的阶段性成果。

份额的研究兴趣。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研究发现主要发达经济体经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对应的观测数据偏离“卡尔多事实”,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再次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话题(Blanchard等,1997;ILO,2015)。(3)三次说和U形说等。Xie(2011)采用多国面板数据,引入三次曲线拟合表征经济增长的人均GDP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函数关系。李稻葵等(2009)对122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开展截面比较,陈宗胜、宗振利(2014)基于中国1997~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从不同的角度发现了U形曲线的存在。

尽管上述三类观点都试图揭示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特征,却得出相异的结论。对于工业化进程中劳动收入份额变动问题,通常的研究方法是基于多国统计数据的计量分析,但存在以下不足:(1)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值得商榷。一些研究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选取反映经济增长或工业化过程的人均GDP指标作为自变量,寻求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关系,但人均GDP与劳动收入份额实际上是一种协变关系<sup>①</sup>,而关注因果分析的计量方法难以适用<sup>②</sup>。在我们看来,人均GDP并非推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根本原因,工业化阶段才是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重点。(2)数据覆盖时段的局限。相关数据倘若不能覆盖一国工业化的整个过程,就无法追踪该国劳动收入份额在工业化过程的完整变动轨迹。(3)无法有效区分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究竟是源于工业化阶段差异,还是源于不同国家的制度文化等因素带来的绝对水平差异。无论是截面数据,还是面板数据(考虑到个体效应可能随时间变化),都无法将两种原因区分出来。

鉴于此,本文尝试运用另一种分析方法——对若干典型工业化国家完整工业化过程相关数据进行时序追踪分析。使用这种方法的关键工作,一是要对典型工业化国家官方公布的数据、权威研究机构收集的数据及诸多经典文献中所蕴含的数据,在可比口径下系统集成。二是以多维判定原则(人均GDP、三产结构、就业结构)表征产业结构的变迁,通过考察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变化对分配结构的影响,将工业化阶段同劳动收入份额趋势分析结合起来。以一种略显粗糙却不失精要的方式,清晰地捕捉到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规律。

<sup>①</sup> ① 人均GDP和劳动收入份额,均受到工业化进程中某些因素的共同影响,都是工业化进程的结果变量。不同工业化阶段存在的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市场和技术特征,才是推动劳动收入份额演绎出变化路径的根本原因。单纯考察人均GDP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函数关系,容易迷失于表面关系而忽视内在关联。

<sup>②</sup> ② Xie(2011)所采用的计量方法存在不可避免的内生性问题,制约着回归系数估计和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所得三次曲线有可能是计量偏误所致。此外,三次曲线特征暗示劳动收入份额在第二个转折点后持续下降、甚至存在趋于零的可能。

## 二、基于若干工业化国家历史的统计考察

本文以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 5 个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为分析对象，在划分各国工业化阶段的基础上，利用纳入自雇者劳动报酬的口径可比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梳理出发达经济国家的工业化阶段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之间的对应关系。

### (一) 工业化进程的阶段划分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国际比较而言，界定各国具体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有着重要意义。学者和经济组织通常将人均收入增长和经济结构转换视为工业化推进的主要标志，并提出许多工业化阶段判断标准，其中人均 GDP 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是用于衡量工业化不同阶段的公认指标。特别是人均 GDP 指标，由于具有现实可操作性成为测度工业化水平的首选(钱纳里等, 1989; Clark, 1937; 库兹涅茨, 1985; Hoffmann 等, 1958)。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本文综合运用人均 GDP 指标、三产结构和就业结构指标，来界定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具体来说，利用麦迪森数据库中的人均 GDP 数据(1990 年不变价美元)、各国三产结构和就业结构数据，依据推算的人均 GDP 标志值(1990 年不变价美元)及陈佳贵等(2012)提出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标志值，开展对各国工业化各阶段的综合判断。结合判断标准，本文认为各国进入工业化初期、中期、后期、后工业化阶段的对应时点依次为：英国 18 世纪 60 年代、19 世纪 50 年代、20 世纪 20 年代、60 年代；美国 19 世纪 30 年代、70 年代、20 世纪 20 年代、50 年代；德国 19 世纪 50 年代、80 年代、20 世纪 30 年代、70 年代；法国 19 世纪 20 年代、70 年代、20 世纪 30 年代、70 年代；日本 19 世纪 70 年代、20 世纪 3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上述划分与国内外学者利用不同指标得出的工业化阶段节点的判断基本一致。

表 1 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

阶 段	人均 GDP(美元)			三次产业产值结构	第一产业 就业人员占比
	1964 年	1996 年	1990 年		
工业化初期	200~400	1240~2480	1080~2160	I >20%且从 I >II 到 I <II	45%~60%
工业化中期	400~800	2480~4960	2160~4320	I <20%且 II >III	30%~45%
工业化后期	800~1500	4960~9300	4320~8100	I <10%且 II >III	10%~30%
后工业化	1500 以上	9300 以上	8100 以上	I <10%且 II <III	10%以下

注：(1)钱纳里等(1989)提出人均 GDP 标志值(1964 年不变价美元)，其他学者基于研究需要计算其他年份与 1964 年的换算因子，得到相应的人均 GDP 标志值(其他年份不变价美元)。本文采用麦迪森数据库的人均 GDP 数据(1990 年不变价美元)，换算得到以 1990 年不变价美元衡量的人均 GDP。1964 年与 1996 年换算因子为郭克莎(2000)根据美国 GDP 平减指数计算调整得出，1996 年与 1990 年换算因子为 0.871，是本文根据美国经济研究局(BEA)提供的美国实际 GDP 数据计算。(2) I 、II 、III 分别代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

## (二) 口径可比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

考虑到统计口径对劳动收入份额跨国长期变动趋势比较的可能影响,本文着重关注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同测算口径。一般来说,工业化发展初期,自雇劳动者就业比重较大,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雇员就业比重会提升至较高水平。为了更完整地反映典型工业化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真实变动,本文认为包含雇员报酬和自雇者劳动报酬的宽口径劳动收入占按要素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的比重(表 2 中口径 F)是一个更合适的测算口径。

表 2 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口径

国民收入	工资	雇员报酬	雇员报酬 + 自雇者劳动报酬
按生产者价格计算	口径 A	口径 B	口径 C
按要素价格计算	口径 D	口径 E	口径 F

由于《联合国国民收入核算账户》仅提供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雇员报酬份额数据,各国官方核算资料也未提供工业化早期的宽口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这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开展跨国比较的难度和工作量。本文收集整理了有关劳动收入报酬研究的诸多经典文献,特别注意不同来源数据的口径一致性,经审慎取舍和衔接,得到较为可靠且可比的、覆盖各国完整工业化过程的宽口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具体来说,在宽口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多种来源的情况下,优先选择各工业化阶段中能覆盖较长时段的数据来源,并以其他来源补充校正缺失年份数值。英国 1920~1960 年数据来自范斯坦(1968)的研究,其他年份数据来自皮凯蒂(2014)的研究。美国 1850~1870 年、1910~1950 年数据来自 Kravis(1959)的研究,1900 年数据来自 Kuznets(1966)的研究,1970~2010 年数据来自皮凯蒂(2014)的研究。德国 1850~1950 年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来自 Hoffmann(1965),1970~2010 年数据主要来自皮凯蒂(2014)的研究。法国 1910 年、1920 年、1950 年数据来自 Kuznets(1966)的研究,其他年份数据来源自皮凯蒂(2014)的研究。日本 1910~1960 年数据来自 Ohkawa 等(1979)的研究,1970~2010 年数据根据皮凯蒂(2014)的相关资料整理而得。

为了考察羹匙曲线稳健性,本文进一步整理各国雇员报酬份额数据(口径 B、E)和其他宽口径劳动份额数据(口径 F),其中口径 B 数据源于 Brown 等(1953)和国际统计年鉴,口径 E 数据主要包括 King(1919)、Schuller(1953)、Kravis(1959)的研究、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Ohkawa 等(1979)、卡米勒·达格穆(1995)的研究,口径 F 下的其他来源为 AMECO 数据库、Minami 等(1981)的研究。

## (三) 工业化进程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轨迹

世界工业化进程最早开始于 18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其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曲线呈先降后升又稍有回落的特征(见图 1)。工业化初期,劳动收入份额从 1770 年的 64% 降至 1840 年的 58%;中期经历明显上升,增加 14 个百分点;在工业化后期均值为 72%,增幅

不足 5 个百分点,图中曲线斜率由较为陡峭变得更为平缓,本文将其视为短期相对稳定状况;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出现小幅下降,但仍高于工业化初水平,2010 年的劳动收入份额为 73%。美国和德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也经历了相似的变动。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初期下降 3.7 个百分点,中期从 1870 年的 63% 增至 1920 年的 70% 以上,之后均值保持在 75% 的水平,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下降态势凸显。德国劳动收入份额于 1890 年降至历史低值 64%,中期有 13 个百分点的回升,后期曲线较为平稳,后工业化阶段又大幅度下降,现阶段与历史低值相近。美、德两国在后工业化阶段经历更大幅度的下降,可能与两国的移民比例高有关。由于法国和日本的工业化发展晚于英国,两国在工业化阶段的年份时点上略有滞后。法国劳动收入份额从 1820 年的 70% 降至 57%,而中期增幅高达 14 个百分点,但 1930~1960 年变动趋缓,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劳动收入份额略有下降。日本工业化初期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明显下降,中期从 1930 年的 60% 跃升至 1950 年 70%,在工业化后期均值为 70%,后工业化阶段略有下降<sup>①</sup>。

总体上,在工业化初期,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劳动收入份额的平均降幅为 8%,工业化中期的平均回升幅度为 12%。工业化后期平均增幅仅为 4%,本文将其视为短期稳定。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回落趋势,平均回落 6%,从水平值上看,该阶段劳动收入份额高于工业化初期。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国家在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安排等方面存在差异,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绝对水平的国别差异。具体来看,在工业化初期,劳动收入份额的阶段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德国(0.73)、美国(0.65)、日本(0.64)、英国和法国(0.62);在工业化中期,依次为德国(0.75)、法国(0.69)、日本(0.68)、美国(0.67)、英国(0.61);到了工业化后期,则为法国(0.78)、德国(0.76)、美国(0.75)、英国(0.72)、日本(0.70);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截至 2010 年),依次为法国(0.77)、美国和英国(0.76)、德国(0.75)、日本(0.73)。除后工业化阶段外,劳动份额的均值极差高达 8~14 个百分点。而完整工业化阶段的时序追踪分析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剥离绝对水平差异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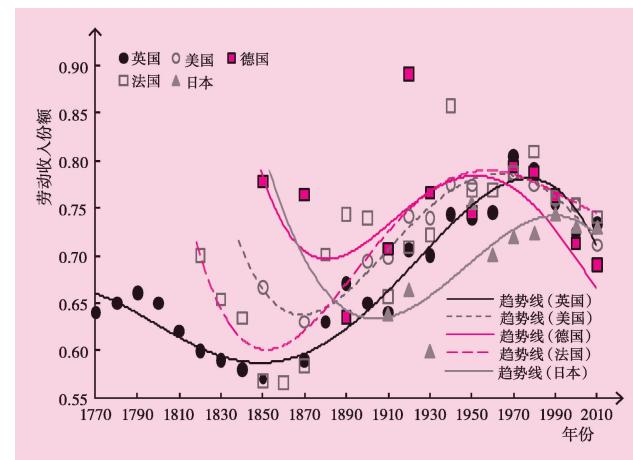


图 1 各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轨迹

注:趋势线根据各国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拟合绘制。

<sup>①</sup> 日本数据缺失较多,本文依据现有数据做出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的粗略判断。

### 三、劳动收入份额的羹匙曲线

#### (一) 羹匙曲线的提出

从图1给出的5个工业化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轨迹可以看出,工业化阶段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存在一种比较稳定的、非线性的关系,颇为形似羹匙(见图2),即工业化初期(AB段)劳动收入份额经历下降;工业化中期出现显著回升,且在后期相对稳定,形成了BD段;在后工业化阶段(DE段)虽呈现回落,但仍高于工业化初期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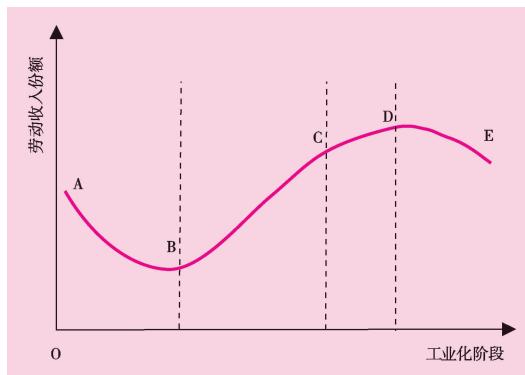


图2 工业化阶段和劳动收入份额的“羹匙曲线”

本文用“羹匙曲线”来表征工业化阶段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是考虑到劳动收入份额曲线和羹匙曲线之间存在有机联系。一是二者在形状上相类似,二是二者在含义和意象上具有关联性。

#### (二) 羹匙曲线与卡尔多事实

虽然有研究对卡尔多事实提出质疑,但要素收入份额稳定在相当长时期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观点。尤其这类研究论据集中于工业化中后期,这与羹匙曲线中后期劳动收

入份额上升的判断存在冲突。为此,本文对卡尔多事实进行考察,发现两者的出入主要是由于稳定阈值设定的差异。20世纪前半叶研究得出劳动收入份额稳定规律,主要与考察期的时段长短及稳定阈值的界定密切相关。Kaldor(1957、1961)提出劳动收入份额稳定的特征事实,所依据的基本文献数据来自Brown等(1953),将1870~1950年英国雇员份额围绕60%上下波动的状态视为稳定(Krämer,2011)。实际上,本文发现,在完整工业化的时间跨度上,1870~1910年的英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雇员报酬份额从55%增长至66%,图3a中变动趋势线呈明显上升态势,波动幅度高于10%,结合图3b不难发现该雇员报酬份额曲线和本文的劳动收入份额曲线的变动趋势一致。

从稳定阈值判断标准看,稳定是相对的,多数文献将要素份额在某一时期内围绕某一水平的波动视为相对稳定。如果将阈值设定为10%左右,那么,固然可认为该时期英国的劳动收入份额稳定。但若进一步考虑所有要素份额总额为1,劳动收入份额10%的相对波动幅度较大,本文认为此阈值可以进一步推敲。如果将阈值降至10%以下,在符合卡尔多特征事实的国家中,劳动收入份额事实上呈现出形如羹匙曲线般的变化(见图3b)。

关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一些学者提出并论证了U形曲线、三次曲线,这些分析部分逼近或契合了羹匙曲线,但相关论据包括数据基础仍然存在问题。本文提出的羹匙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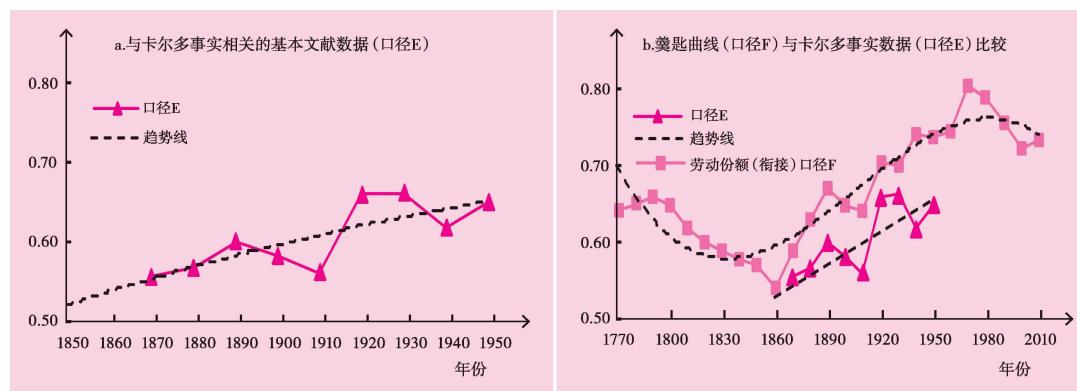


图3 卡尔多事实所依据的基本数据及其比较

注:口径 E 为 Brown 等(1953)中的英国雇员报酬份额,口径 F 为英国劳动收入份额。

线更完整地呈现劳动收入份额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变动特征,存在两个显著的转折点(见图 2 的 B 点和 D 点)。羹匙曲线在工业化中后期的上升阶段与 U 形曲线右半支类似,但本文以多个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的历史时序数据更有力地支持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回升期的结论。此外,本文提出的羹匙曲线在向后工业化转变过程中存在第二个转折点,这说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升是有时限的。这个发现对中国更具现实意义。

### (三) 羹匙曲线隐含着趋于缩短的“机会窗口”

回顾典型工业化国家发展历史,本文认为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结束,工资趋向于维生工资的框架被打破,工业部门从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得以提升,而经济水平发展和消费结构变化也带来了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这些服务业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高,促进工业化中后期整体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但就后发国家而言,考虑到后发国家面临更为宽广的技术选择、快速转型升级的消费结构、步伐加快的技术更新,在这样的工业化发展情境下,产业结构演替速度加快,中后期持续时间趋于缩短,并且存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可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速率上升的概率变小,甚至可能下降。后发国家呈现出不同于先发国家的经济发展特点和工业化模式。从表 3 可以看出,英国、美国、德国从工业化初期开始到后工业化阶段分别用了 200 年、125 年和 120 年,日本工业化起步较晚,明治维新时期其工业才逐步开始发展,历时 100 年实现了工业化。韩国工业化速度较快,仅用了 30~40 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化过程。

总之,本文从典型工业化国家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事实中抽象出羹匙曲线,发现工业化进程中存在劳动者“奶酪”失而

表3 若干国家的工业化完成历时年数

国家类型	开始年代	结束年代	历时(年)
先发国家			
英国	1760	1960	200
美国	1830	1955	125
德国	1850	1970	120
后发国家			
日本	1870	1970	100
韩国	1950~1960	1995	35~45

复得的“机会窗口”,但由于后工业化阶段劳动收入份额会下降,这种“机会窗口”稍纵即逝。进一步考虑后发国家呈现不同的工业化模式,其相应的工业化进程高度压缩且面临劳动收入份额变动速率难以提升的困境,由此可以推断羹匙曲线所隐含的“机会窗口”在缩小。

#### 四、羹匙曲线的稳健性考察

本文通过不同统计口径和相同口径下的劳动收入份额的横向比较,在统计口径视角下开展稳健性考察,分析羹匙曲线结论的可靠性。不同口径具体比较的是雇员报酬份额数据(口径B、E)和本文衔接得到的包含自雇者劳动收入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口径F),而相同口径下比较的是采用不同自雇者劳动报酬调整方法得到的宽口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口径F)。结果发现,虽然既有文献主要是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片段性呈现,而本文是在工业化完整进程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整体性探讨,但能够与其他文献的数据相互印证,也就是说,以往研究也隐含着本文发现的形如羹匙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曲线。考虑到对于劳动收入份额在工业化初期的下降,学界并不存在争议,本文主要考察工业化中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的变动趋势。

在工业化中后期中,我们先比较英国不同统计口径和相同口径下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尽管不同口径下各项研究中劳动份额的相对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即雇员报酬份额略低于宽口径劳动收入份额,但其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工业化中期,英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幅度接近10%,而雇员报酬份额水平虽相对略低,但呈现出大于10%的上升。虽然各研究中宽口径劳动收入份额数值并不相同,但本文所得到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的变动趋势同多数文献的趋势高度一致。

其他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横向比较也有力支持以上论断。以不同口径下的横向比较为例,美国劳动收入份额在1870年为63%,1920年高达74%,而其他核算资料也表明,与19世纪相比,1910年以来美国雇员报酬份额也实现了显著增长(King, 1915; Kravis, 1959; Schuller, 1953)。根据Kuznets(1966)<sup>①</sup>、Ohkawa等(1979)的研究,1895~1924年德国劳动收入份额和雇员报酬份额增幅大于20个百分点,而1937~1964年日本相应增幅大于10个百分点。

就后工业化阶段而言,国际统计年鉴雇员报酬数据从不同口径的视角支持劳动收入份额呈现下降趋势的结论。从相同口径分析看,根据欧盟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后工业化阶段各国劳动收入份额减少幅度基本大于5%,同样存在明显的下降态势。

<sup>①</sup> Kuznets(1966)将个体经济收入在劳动和资产之间进行分割,根据个体经济中劳动报酬比重的高低假设提出两种不同划分方法。

## 论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的“羹匙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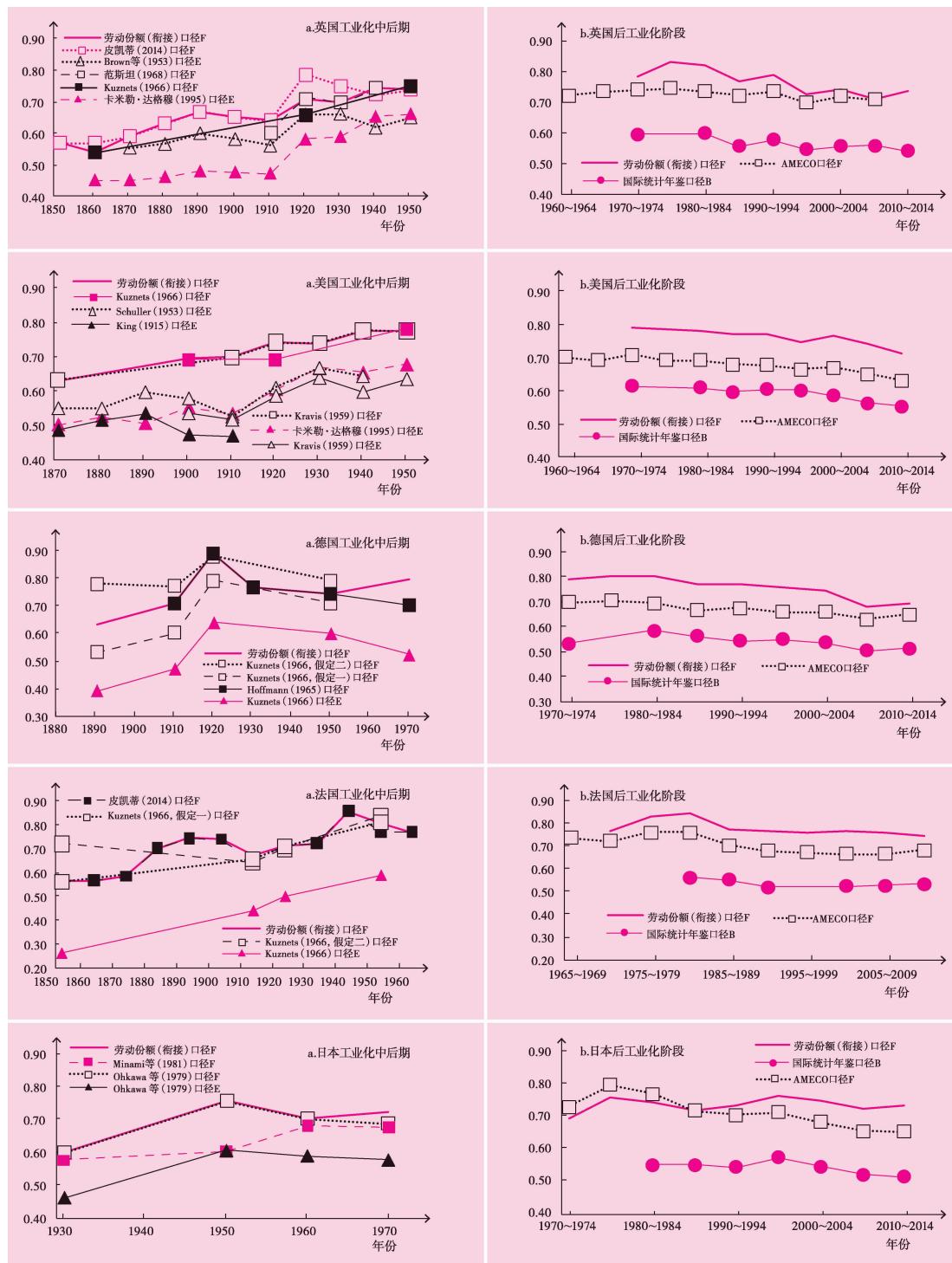


图4 工业化中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的劳动收入份额的横向比较

注:图a为各国工业化中后期劳动收入份额的横向比较;图b为各国后工业化阶段劳动收入份额的横向比较。

## 五、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分析

本文认为,产业结构变迁是解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基本视角,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主要表现在产业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和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两个方面(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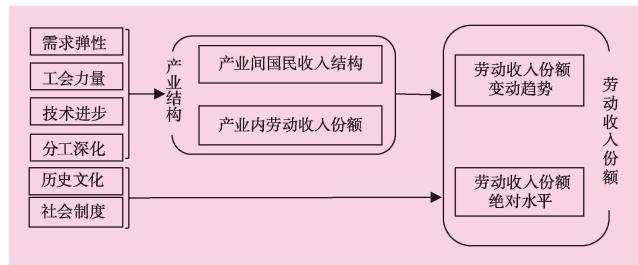


图 5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内在机制

自工业革命以来,农业部门产值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产值比重趋于上升,被称为 Kuznets 事实(Clark, 1940; Kuznets, 1957; Chenery, 1960)。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化,产业结构变动出现新特征,工业部门产值比重逐渐下

降,经历“倒 U”形变化过程,同时,服务业比重进一步快速提升,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这种反映经济结构变化的现象被归纳为“后工业化事实”(Bell, 1973; 徐朝阳, 2010)。

本文将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纳入考量范畴,主要考虑到总体劳动份额的变化可能由产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引起。一般而言,农业属于传统的典型劳动密集型行业,受自然条件局限较大,劳动生产率偏低,在三大产业中农业的劳动报酬占比最高。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产业内部劳动生产率高,较大的人均资本占有量和较高的专业化分工水平,使其劳动报酬占比水平低。除了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传统服务业外,与新科技紧密结合的现代服务业,生产率水平和资本密集度存在较大差异,服务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会随着内部构成变动而改变。一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是按照各产业产值比重的加权平均。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LS = \sum_i \frac{Y_i}{Y} \times \frac{W_i}{Y_i} = \sum_i \frac{Y_i}{Y} \times \frac{\omega_i \times L_i}{Y_i} = \sum_i \frac{Y_i}{Y} \times \frac{\omega_i}{Y_i/L_i}$$

其中, $\omega_i$ 、 $L_i$ 、 $Y_i$  分别为第  $i$  个产业的平均工资、从业人数和产值, $W_i$  为第  $i$  个产业的劳动收入总额, $Y$  为总产出。上式表明,产业间国民收入结构变动和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共同决定了一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同时受产业结构  $Y_i/Y$ 、产业工资水平  $\omega_i$  和表征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劳均产出  $Y_i/L_i$  的影响。本文通过聚焦需求弹性、分工深化、技术进步和工会力量 4 个方面,以分阶段方式开展有关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理论探讨。

在工业化之前,作为主导经济的农业部门产值占比较高,农业生产过程的人力投入高于资本投入,存在偏高的产业内劳动报酬份额,社会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较高。在工业化初期,人们对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动带来各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低,工业产品需求收入弹性高,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提高,产业结构重心由农业转向工

业,工业产值比重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与技术进步和分工演进密切相关的劳动生产率也在发生变化。工业部门受益于机械化和专业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增速最快,而农业部门受制于有限土地剩余劳动力,增速较慢。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和成熟工会力量缺乏的背景下,农业部门劳动者获得维生收入,相应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不大,而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虽略高于农业劳动者收入,但实际所得远低于其自身边际产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好处大多为资本所有者获得,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总体来说,工业化初期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工业部门产值比重增加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面影响。

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虽然工业仍是经济增长主要支柱,但服务业需求弹性较高,工业内部分工深化诱发对中间服务的需求,收入水平提高也增加对最终服务的需求。受制于有限的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密集且技术构成较低的流通服务业和生活性劳务服务得以快速发展。该阶段同样存在产业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快于服务业,换言之,工业人均产出进一步提升,而服务业人均产出相对较低。此外,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结束和工会谈判力量的增强,劳动者工资跨越拐点,整体工资水平快速提升,而技术门槛较低的服务业,由于存在激烈的内部竞争和劳动力在部门间自由流动的可能,相应的工资水平也水涨船高。工资与劳均产出间差异的缩小带来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显著回升。

在后工业化阶段,从产值结构看,工业让位于服务业,且产业结构的变动进一步延伸至第三产业内部,专业化程度高、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取代与工业产品生产融通相关的流通服务业成为支柱产业(邓于君,2009;何传启,2016)。从产业内劳动收入份额看,一方面,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变动相对增加对技能劳动的需求,相对减少对非技能劳动的需求,在提升技能劳动者工资的同时,会降低非技能劳动者的工资,进一步考虑技能劳动同资本之间的互补关系,技术进步在分配上偏向资本,会导致服务业整体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过程外包给工资水平低的国家以降低对本国的劳动需求,国际贸易份额的增加使要素收入分配倾向于对劳动不利,而该阶段工会力量的弱化进一步对工人的谈判地位和议价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劳动生产率同工人工资差距拉大,使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降低。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下降。

## 六、结论及启示

本文发现,工业化过程中劳动者在工业化初期失去的“奶酪”可以失而复得,至少在西方国家劳动者失去的“奶酪”实现了复得。这也是这些国家至今仍能保持较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原因。根据工业化进程中西方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羹匙变动规律,中国抓住工业化中后期的“机会窗口”,劳动收入份额也可以经历上升期。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在

经历1992~2003年相对较长时间的快速下降后,目前虽摆脱持续下跌趋势,却呈现低位徘徊特征。究其原因,中国经济虽得以不断增长,但制度改革并不完全,要素市场尚存在诸多的制度性障碍,无法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的提升作用,使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在低谷徘徊的时间增加。随着技术转移扩散,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会呈现“压缩式的工业化”成长模式(Whittaker等,2010),劳动者“奶酪”失而复得的“机会窗口”的持续时间可能会大大缩短,羹匙曲线的意义在于提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及时把握调整劳动收入份额的“机会窗口”。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如目前尚未找到适用于分析工业化3个阶段全过程的解释理论,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机制的讨论处于初步阶段。如何构建一个统一理论框架以解释工业化进程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 参考文献:

1. 白重恩、钱震杰(2009):《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第3期。
2. 陈佳贵等(2012):《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 陈宗胜、宗振利(2014):《二元经济条件下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财经研究》,第2期。
4. 邓于君(2009):《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变、机理及启示》,《学术研究》,第9期。
5. 郭克莎(2000):《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6. 何传启(2016):《中国现代化报告——服务业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7. 卡米勒·达格穆(1995):《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要素分配》,载于《收入分配理论》,商务印书馆。
8. 库兹涅茨(1985):《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商务印书馆。
9. 李稻葵等(2009):《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第1期。
10. 李嘉图(1987):《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八卷)》,商务印书馆。
11. 吕光明、李莹(2015):《中国劳动报酬占比变动的统计测算与结构解析》,《统计研究》,第8期。
12. 范斯坦(1968):《1860年以来联合王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载于马赛厄斯、波斯坦(2004):《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3. 皮凯蒂(2014):《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
14. 钱纳里等(1989):《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15. 徐朝阳(2010):《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倒U型”产业结构变迁》,《世界经济》,第12期。
16. 张车伟(2016):《中国劳动报酬份额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7. Allen, R.C. (2009), Engels' Pause: Technical Chang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equality in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6(4):418–435.
18. Bell, D.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 Blanchard, O.J., Nordhaus, W.D., and Phelps, E.S. (1997), The Medium Ru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8(2):89–158.
20. Brown, E.H.P., and Weber, B. (1953), Accumulation, Productivity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British Economy, 1870–1938. *The Economic Journal*. 63(250):263–288.

21. Chenery, H.B.(1960), Patterns of Industrial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0(4):624–654.
22. Clark, C.(1958),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London: Macmillan.
23. Cobb, C.W., and Douglas, P.H.(1928), A Theory of Produc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8(1):139–165.
24. Hoffmann, W.G., Wright, J.F., Henderson, W.O., and Chaloner, W.H.(1958),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5. Hoffmann, W.G.(1965), *Das Wachst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eit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Berlin: Springer.
26.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15), *Global Wage Report 2014/15: Wag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7. Kaldor, N.(1957),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67(268):591–624.
28. Kaldor, N.(1961),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utz F.A., Hague D.C.(eds), *The Theory of Capital*. London: Macmillan.
29. Kalecki, M.(1939),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Fluctuation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30. Karabarbounis, L., and Neiman, B.(2014),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1):61–103.
31. King, W.I.(1915), *The Wealth and Income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Macmillan.
32. Krämer, H.M.(2011), Bowley's Law: The Diffusion of an Empirical Supposition into Economic Theory. *Papers in Political Economy*. 61:19–49.
33. Kravis, I.B.(1959), Relative Income Shares in Fact and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9(5):917–949.
34. Kuznets, S.(1957),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IV.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by Factor Shares.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7(3):1–100.
35. Kuznetz, S.(1966),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36. Minami, R., and Ono, A.(1981), Behavior of Income Shares in a Labor Surplus Economy: Japan's Experi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9(2):309–324.
37. Ohkawa, K., Shinohara, M., and Meissner, L.(1979), *Patterns of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 Quantitative Appraisa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38. Schuller, G.J.(1953), The Secular Trend in Income Distribution by Type, 1869–1948: A Preliminary Estimat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35(4):302–324.
39. Tripp, L.R.(1951), Labor's Share in the National Incom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74:47–56.
40. US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Part 2*.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41. Whittaker, D.H., Zhu, T., Sturgeon, T., Tsai, M.H., and Okita, T.(2010), Compressed Developmen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45(4):439–467
42. Xie, D.D.(2011), A Generalized Fact and Model of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Kaldor Fact as a Special Case. Working Paper Series WP11–4,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7(2):319–341.

(责任编辑:朱 犀)